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现代三大 经济理论体系的 比较与综合

当代
经济学
文库

樊 纲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现代三大 经济理论体系的 比较与综合

樊纲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樊纲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文库/陈昕主编)

ISBN 7-208-06115-7

I. 现... II. 樊... III. 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740 号


责任编辑 何元龙 王 炜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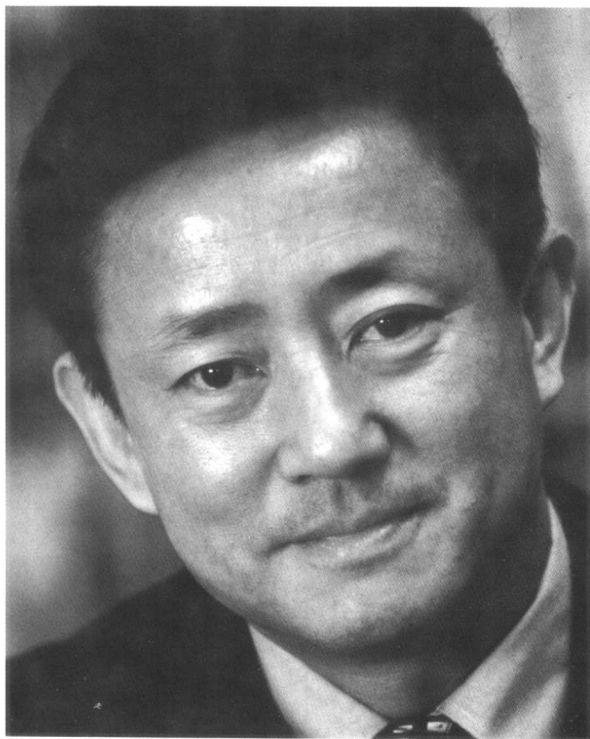
吕敬人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

樊 纲 著

<p>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p>  <p>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出品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021-63914988</p>	<p>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0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新 1 版 2006 年 3 月新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6 字数: 244,000</p>
ISBN 7-208-06115-7/F·1385	定价: 24.00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樊纲, 1953年生, 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 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5—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曾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兼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 发表《灰市场理论》、《改革的动态过程》等中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 著有学术专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 论文集《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 英文专著 *Industrial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in China*, 日文专著《中国: 未完成的改革》。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05年9月, 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国《观点》杂志共同评选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则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

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
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
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
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
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
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
的未来。

序

从 1902年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中文算起，西方经济学被引进我国，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来自西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学界占据了统治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更有大量的西方经济理论被介绍给国内理论界。引进了许多理论，如何消化、掌握、融汇贯通，如何对各种理论本身，对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比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而正确地加以利用，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却一直是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也是摆在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樊纲的新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无疑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大胆、可贵的新探索。

1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主流为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

间,就其实证内容而不是价值判断而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多年来不断被世界上经济学家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因而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回答。

一种过去颇为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而其他各种经济理论都属于“庸俗经济学”,是“伪科学”,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仅就忽视对社会经济矛盾的研究,不去努力揭示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维护现存制度这一点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符合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定含义。但是,正如《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中指出的,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利用有限物质资源满足各种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研究对象是多方面的,经济科学本身也就应该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一种经济理论,如果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前提下对人与物的关系这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理解有关经济现象的理论和方法,把人类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推向了前进,有利于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一些经济问题,它就具有一定的科学真理性,同样构成经济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伪科学”之类的概念对其进行“定性”或区分,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科学的。

另一种也曾颇为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经济运动的实质(社会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则是经济运动的形式(物质关系),因而前者揭示了经济现象的本质,而后者只能描述现象;西方经济学中起基本解释作用的效用偏好之类的概念,也都是些“现象形态”。这种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这里首先要认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物质需要与物质生产活动本身的相互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产活动,同样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面,甚至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经济交往的动因和前提;社会经济关系,最终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经济学不等同于历史哲学,但根据这种哲学观点,我们至少不能说物质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

“现象形态”。就经济学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而言,如价格、需求、供给、经济增长等等,都是由多种基本的、内在的经济因素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利益矛盾,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人们对物品的效用偏好、投入产出的物质技术关系等等,同样是重要的、内在的、非“现象”的因素,也是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的一些深层的、“实质”性的基本因素;不对这些因素本身及其在经济运动、经济变量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的、有时是抽象的分析,我们同样不能完整而科学地说明各种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分析了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利益矛盾在经济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对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则深入分析了人的物质需求偏好结构、现存生产技术对经济变量的决定作用,深化了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这同样是必需的,是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且,这种分析也属于对现象背后的一些内在因素的分析,并不仅仅是现象描述。因此,正如《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所指出的,用“本

质”和“现象”的关系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也是不恰当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主要研究了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具体运行过程。这种观点失之偏颇的原因则在于没有注意到，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明离不开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因为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利益矛盾，正是通过经济运行机制而进行和展开的。同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说明各种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变量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就是经济运行机制；脱离了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也就无法用经济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都是先从经济运行机制入手，然后在说明了基本关系之后进一步说明社会利益矛盾是如何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决定各种经济变量、产生各种经济现象的。因此，说马克思没有分析经济运行机制，是不正确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

合》中指出,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具有多重的功能规定,既是经济利益矛盾实现和发展的机制,也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经济理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分析了经济运行机制,而在于着重分析了它的某一种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将经济运行机制作为人与人的利益矛盾实现和发展的机制进行了考察,而新古典主义等理论则着重将其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进行了考察。这一论点显然更符合逻辑。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不同经济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范围”(ranges):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基于内在矛盾而发展演变的逻辑;而西方正统理论研究的则是现实“日常经济生活”的规律。这是最早由奥斯卡·兰格博士1935年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观点,至今在西方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经济学家中也颇为流行。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因为马克思当年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目的主要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经

济本身的各种现象,为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维持现存制度提出“对策”。但是,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与理解日常经济问题无关。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关于社会经济利益矛盾的分析,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现象,如经济周期、失业、通货膨胀,甚至价格决定等,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说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关于生产函数、经济增长等理论的研究,对于认识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没有积极的意义。

现在,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樊纲又提出了一个颇为独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在于它们对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把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加以肯定,然后着重考察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

系本身,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在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主要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正是因为不同经济理论的差别主要是研究角度和分析侧面的差别,它们也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正确认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就可以运用正确的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综合起来(樊纲提出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新综合”),利用已有的各方面的理论,形成统一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加全面而科学地解释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变量,说明经济现象。

这一观点还刚刚提出,能否经得住理论家们的批评,能否经得住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史的进一步检验,自然还有待时日。但读者可以看到,书中对这一基本论点的论述是充分的、严谨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是建立在作者对各种经济理论的内容和方法的透彻理解,对经济思想史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在应用这一

论点重新考察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如长期争论的“价值—价格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等)时,也是能够有所创新的,并因此而显示了这一论点的理论价值。

2

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改造社会,增进全民的福利,昌盛民族的未来,与这一目的直接相关的,自然是经济政策。但是,怎样才能研究制定出科学的、有效的经济政策?除了需要对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入的了解之外,特别需要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且,不仅需要与当前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具体理论,而且需要有对于经济学基本问题作出解释的基础理论。就像没有高能物理等基础理论为后盾,就不可能造出原子弹一样,没有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深入了解,就不能提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越是在现实经济问题紧迫的时候,就越是不能忽视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4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犯了不少错误,以致远远地落在了世界先进国家的后面。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上上下下都有一种紧迫感,经济学家们也想尽快地找出改革和发展的“治世良方”,政策研究成为“热门”,各种对策争相问世,这无疑对前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对策热”中,出现了忽视甚至轻视、荒疏基础理论研究和急功近利的倾向。一方面,缺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更是成了“冷门”。有些人对西方的各种经济理论,不愿去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读了一二本经济学著作(并且往往是一二本某一学派的著作),便以为掌握了全部经济学;尚未搞清楚一种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各種前提假设,就急于拿来应用于解决我国面临的特殊经济问题,结果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政策结论”,往往很难避免“下错了药”。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些情况中及时吸取教训了。这不仅关系到我